

# 高校突发事件中的学生话语权失衡与治理转向研究

蒋智华<sup>1, 2</sup>

1. 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柳州 545006

2.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福建厦门 361000

**摘要:** 在风险社会与全媒体时代交织的背景下, 高校突发事件的管理效能愈发依赖于有效的舆情应对与话语互动。大学生作为高校的核心利益相关者, 其话语权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事件解决的进程与效果。当前高校突发事件治理中, 普遍存在着学生话语权失衡的现象, 具体表现为表达渠道的形式化与阻塞、话语影响力的边缘化与消解, 以及话语主体的失范与极化。究其根源, 这种失衡是传统“管控型”治理惯性与网络传播多元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是高校应急管理体系滞后于学生主体性成长的时代性落差, 亦是学生媒介素养与公共理性尚待成熟的客观体现。鉴于此, 高校突发事件治理亟需实现从“刚性管控”到“韧性引导”的根本性转向。具体策略包括: 构建制度化对话平台, 实现话语渠道从“阻塞”到“疏浚”的转向; 培育校园公共理性, 推动话语品质从“失范”到“规范”的转向; 以及重塑高校应急管理模式, 促成治理理念从“管理”到“协同”的转向, 从而构建一种基于权利尊重、理性对话和良性互动的校园治理新生态。

**关键词:** 高校突发事件; 学生话语权; 话语权失衡; 治理转向; 协同治理

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警示我们, 后工业社会充斥着无法预料的系统性风险<sup>[1]</sup>。高校作为社会缩影与前沿阵地, 各类突发事件频发, 使其治理体系面临严峻考验。互联网技术的赋权极大地激发了大学生的表达意愿与能力, 使其在高校突发事件中的话语行为成为影响事态发展的关键变量。现有研究多从管理者视角探讨舆情“管控”, 或将学生视为被动客体, 未能将“学生话语权”置于治理结构的中心进行审视。学生话语权, 即学生在关涉自身利益的突发事件中, 所享有的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的权利及其实质影响力, 是高校民主治理的基石。当前, 学生主体性高涨与高校传统“管控型”应急模式之间的张力, 导致了学生话语权的显著失衡。这一困境不仅阻碍事件的有效解决, 更可能侵蚀校园信任基础。因此, 研究旨在剖析此种失衡的多维表征与深层逻辑, 并探寻一条从“失衡”到“重构”的治理转向路径, 为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镜鉴。

## 一、高校突发事件中学生话语权失衡的多维表征

学生话语权的失衡并非单一权利缺损, 而是贯穿表达渠道、话语效能与主体行为的系统性治理困境, 折射

高校治理现代化转型与数字对话机制建构的双重滞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 话语配置映射权力结构, 也深层影响学术共同体建设与人才培养质量。

### 1. 表达渠道之困: 形式化与阻塞化

理想的表达渠道应畅通、有效并能引发反馈, 然而官方路径在突发事件中常显迟钝。一是制度层面, 校长信箱、学生会等缺乏明确响应时限与问责标准, 学生诉求易在层级传递中被消磨; 操作层面, 管理人员秉持“不出事”逻辑, 倾向用标准化模板回复, 单向传递取代互动对话, 难以回应具体关切。二是当学生转向社交媒体自组舆论场, 部分高校立即采用删帖、禁言、降权等技术—行政手段进行“阻塞化”处理, 看似控制事态, 实则把话语能量逼入更隐蔽的“亚文化圈”<sup>[2]</sup>, 为谣言与情绪极化提供温床, 反噬整体治理效能。形式化与阻塞化叠加, 使制度内渠道失去公信力, 体制外表达又遭挤压, 学生话语权在源头上被大幅削弱。

### 2. 话语影响力之弱: 边缘化与消解化

话语权的核心在于对决策的实质影响力。高校应急决策链条相对封闭, 学生代表缺位, 诉求难以进入核心议程, 首显“边缘化”。更深层的排斥是知识类型学歧视: 事件处置被建构为专业技术管理问题, 行政专家话语被视为唯一合法知识, 学生的经验感受与情境知识被贴上“非理性”“情绪化”标签, 排除在有效证据之外。

**基金项目:** 2023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研究课题“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 23FZZ007) 阶段性成果。

即便校方回应，也常采用“消解化”策略——通过“避重就轻”或“话语重构”偷换议题，如将具体管理质疑转化为“感恩意识”“大局观念”的道德呼吁，在象征层面稀释学生诉求的正当性。福柯意义上的话语规训于此显现：权力对异质话语进行收编与中性化，既维护现有秩序，也使学生难以获得与专家平等对话的地位。长期边缘与消解，不仅削弱学校公信力，更易在学生群体中生成政治疏离，侵蚀校园民主根基，使学术共同体失去应有的对话与反思活力。

### 3. 话语主体之失：失范与极化

结构性障碍之外，学生作为话语主体亦呈现局限。网络匿名性带来责任分散效应，文字交流缺少情感温度，流量导向的注意力经济进一步鼓励激烈言辞，导致言论“失范”——理性诉求常被极端情绪淹没。同质化圈层内的“群体极化”效应显著<sup>[3]</sup>：初始观点在“回声室”中被反复强化，逐步走向极端，勒庞所言“群体狂想症”显现<sup>[4]</sup>，理性对话空间坍塌，共识难以达成甚至激化对立。社会心理机制上看，突发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促使个体寻求群体认同，通过采纳更鲜明立场获得归属感；算法推荐则加剧信息茧房，不断推送强化既有观念的内容，固化认知偏见。失范与极化不仅削弱学生群体的内部整合力，也反向为管理方提供“去正当化”口实——以“维护秩序”为由进一步强化阻塞手段，形成话语权失衡的恶性循环。

## 二、学生话语权失衡的深层生发逻辑

学生话语权失衡现象背后蕴含着技术、制度与主体三个层面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共同形成了问题的复杂生成机制。要深入理解这一现象，必须将其置于中国社会转型与高等教育改革的宏观背景中考察。高校作为特殊的社会组织，其内部话语秩序既反映着宏观社会结构特征，又受特定组织场域运行逻辑的制约，因此需要建立微观现象与宏观结构之间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从多维度揭示问题的本质。

### 1. 结构性矛盾：传统“管控型”治理惯性与网络传播多元性的冲突

我国高校长期形成的“管控型”治理模式与网络时代的传播特性产生深刻矛盾<sup>[5]</sup>。这种治理惯性植根于行政主导的体制文化，其突出特点是强调秩序稳定优于活力激发，依赖层级控制胜过多元参与。科层制管理的内在逻辑要求通过标准化、可预测的程序来实现控制目标，这与网络传播的去中心化、扁平化、多元化本质形成尖锐对立。从深层次看，这种结构性矛盾导致管理者形成

特定的认知框架：往往将学生的集体表达视为对既定秩序的挑战，而非改善治理的宝贵资源。组织社会学中的“制度同形化”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持久性：在不确定性环境中，高校倾向于模仿被认为成功的同类组织的行为模式，即使这些模式的实际效果存疑。此外，当前高校的考核评价体系偏向量化科研指标和显性稳定指标，而对治理能力、学生满意度等软性指标关注不足，这种激励结构的偏差进一步强化了管控导向的行为模式，使治理创新缺乏内在动力。

### 2. 时代性落差：高校应急管理体系滞后于学生主体性成长的时代性落差

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深刻塑造了当代大学生鲜明的“主体性”特征<sup>[6]</sup>。这种主体性觉醒是多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带来的家庭关注中心化、消费社会中个体权利的日益彰显、全球化背景下个人主义文化的传播等，共同培育了新一代大学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权利观念。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普及，为学生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赋能，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转变。然而，高校应急管理体系仍然建立在传统的信息传播环境基础上，在响应速度、透明度和互动性方面与学生群体的新时期期望形成显著落差。这种滞后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深层次的是管理理念的更新不足。传统的线性危机管理模型建立在“刺激—反应”的简单化假设基础上，而网络时代的舆情演化具有高度的非线性、涌现性特征，这使得基于前互联网时代思维的管理模式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挑战。当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无法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表达需求时，话语能量必然寻求非正式出口，从而加剧了治理的难度和复杂性。

### 3. 主体性局限：学生媒介素养与公共理性有待成熟

学生主体意识的高扬并不必然伴随其理性表达能力的成熟，这种差距构成了话语权失衡的主体性因素。从教育背景看，我国基础教育阶段长期存在的应试教育倾向，导致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媒介素养的系统性培养相对不足。这使得部分学生进入大学后，虽然具备强烈的表达意愿，却缺乏必要的信息甄别、理性论辩和公共协商能力。更重要的是，“公共理性”作为现代公民意识的核心要素，其培养需要在真实的公共生活实践中逐步实现<sup>[7]</sup>，而当前校园公共空间的发育不充分限制了学生这方面的成长机会。这种主体素养的局限性使得学生的表达容易为情绪所主导或被圈层认同所束缚，难以形成建

设性的公共对话。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局限并非学生群体所特有,而是社会转型期的普遍现象。在传统权威弱化而新价值体系尚未完全确立的背景下,整个社会都面临着公共理性不足的挑战。因此,高校作为育人机构,在关注学生表达失范现象的同时,更应反思自身在培养学生媒介素养与公共理性方面的教育责任,将相关能力的培养有机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 三、从失衡到重构:高校突发事件治理的路径转向

当前高校突发事件治理中学生话语权失衡的问题,迫切需要对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进行系统转变。这种转变的实质是要从传统的“刚性管控”思维转向更具包容性的“韧性引导”<sup>[8]</sup>和“协同治理”模式。这种转变不仅符合全球公共行政改革的发展趋势,也是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实现这一转变,需要从制度设计、能力建设、文化培育等多维度开展协同创新,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校园治理新格局。

#### 1. 构建制度化对话平台,实现话语渠道从阻塞到疏通的转向

建立信任的基础在于构建畅通的沟通渠道。高校应当摒弃简单的“封堵思维”,着力构建多元化、制度化的对话平台。具体而言,需要建立以学校官方新媒体为核心,有效整合各院系、职能部门和学生组织的协同传播网络。要制定明确的信息发布流程和责任清单,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遵循“黄金4小时”原则,及时、准确地向师生发布权威信息。同时,应当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协商机制,例如设立常态化的“校园议事会”和应急状态下的“临时听证会”制度,确保学生代表能够实质性参与决策过程。此外,还要通过改革学生代表大会等传统机制,使其真正成为学生诉求进入决策主渠道的有效载体。

#### 2. 培育校园公共理性,推动话语品质从失范到规范的转向

治理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体的理性精神和对话能力。高校需要将媒介素养与公共理性培育有机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sup>[9]</sup>。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应当将媒介素养教育、批判性思维训练、协商民主实务等内容纳入通识教育核心模块,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项目式学习等多种方式,着力提升学生的信息甄别能力、证据运用能力和理性论辩能力。在实践平台搭建层面,要支持学生自主运营校园媒体、组建辩论社、开展模拟议会等活动,让学生在真实的公共生活实践中学习如何

负责任地行使话语权利、承担话语责任。特别需要重视的是,要有意识、成体系地培育一支深谙网络传播规律、富有责任感的学生意见领袖队伍,使其在舆情事件中能够发挥“稳定器”与“桥梁”的重要作用。

#### 3. 重塑应急管理模式,促成治理理念从管理到协同的转向

最深层次的转型在于治理理念的根本性革新,即要真正承认学生是高校治理共同体中平等的、不可或缺的主体。在目标定位上,应当从单纯追求“快速平息事态”的短期目标,转向“有效解决问题”“修复和增进信任”“优化治理体系”的长期目标。在组织结构上,要打破传统的、封闭的科层化应急指挥体系,构建更加开放、灵活的“校生命共同体”应急响应系统。例如,可以建立常设性的“校园安全与学生权益协同治理委员会”,通过民主程序吸纳学生代表进入决策层,共同参与应急预案的制定、演练、评估与修订工作。在流程设计上,应当建立基于大数据舆情感知、多维度会商研判、精准化信息推送、双向化沟通反馈、制度化评估学习的闭环管理系统,使协同应急从临时的权宜之计转变为稳定的制度安排。

#### 参考文献

- [1][德国]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2]赵明悦,周菲.大学生网络亚文化圈层的潜在风险及其化解策略[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25,41(03):49-59.
- [3]蔡卫忠,赵通.网络群体极化的风险与治理[J].山东社会科学,2024,(05):112-119.
- [4]毛飞.群体狂想症:分析与解决之道[J].天府新论,2003,(06):73-75.
- [5]陈天祥.摆脱管控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J].国家治理,2015,(09):29-34.
- [6]詹茹冰.论网络社会中人的主体性特征及其发展[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0):22-24.
- [7]陈雅文.论共情在公共理性中的地位[J].社会科学辑刊,2025,(06):50-58.
- [8]王纯.“脆皮”与“韧性”:当代大学生心态透视与引导策略[J].青年学报,2024,(06):43-47.
- [9]苏霞.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主导权建设与网民公共理性培育研究[J].长春大学学报,2022,32(11):86-90.